引言一：

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劳动力投资——基于“劳动经济学与金融”视角的研究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李小荣 张丽男

联合国2610年《世界人口展望》（告上的数据资料显示，中国目前老龄化率为10% ,位居世界 第57位，并且这一排名呈现继续提升趋势，预计从目前至61世纪64年代将是老龄化速度最快的 阶段。伴随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重，我国劳动力总量及占比都呈现严重的下滑趋势:联合国老龄 化议题相关的数据资料显示，中国2019年15—59岁劳动力人口总量为9. 37亿人，占总人口的 67% ,预计到2030年，2050年，劳动力人口总量将分别降至8.77亿人、7. 10亿人，占比分别降至59%、50%。由此可见，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作为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的人口红利已逐渐走向尾声，该现象的出现将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较大压力。对企业而言，劳动力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约有三分之二的企业产出都用于补偿劳动投入。对于以服务和技术为导向的现代经济，劳动力已经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产。因此，研究企业劳动力投资的影响因素并优化劳动力配置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对于当下的中国还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劳动经济学与公司金融的结合是目前学术界的热点话题之一，其中公司金融对劳动力投资影 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从企业融资角度,学者们发现当企业的债务融资不足，尤其是面临银行 信贷收紧时，企业往往会倾向于解雇员工,而当企业通过首次公开发行（IPO）进入资本市场时，企业倾向于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从公司治理角度，学者们发现以利益相关者为取向的企业更多显示出较低的劳动力流动和裁员水平，外部董事更倾向于实施裁员以及员工自愿或提前退休，内部人员则更倾向于减少对新员工的招聘和保护在职员工。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公司的盈利情况、偿债能力、公司治理等因素对企业劳动力投资的影响。但根据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企业劳动力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缺乏对企业供应链关系的关注。

事实上，供应商作为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经营、战略等方面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市场竞争关系已逐渐从企业间的竞争转变为供应链间的竞争，供应商-客户关 系对公司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得到实务界和学术界的重视。现有的供应商-客户关系相关文献，主 要以关系专用性投资理论、谈判力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作为理论基础，研究供应商-客户关系对商业信用、企业业绩、现金持有水平等的影响，鲜有学者关注供应商-客户关系对企业劳动力投资的影响。实际上，当企业过度依赖某几家大供应商时,企业与供应商的关系不仅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还可能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及风险状况。进而作用到企业劳动力投资决策上。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供应商集中度是否会对企业的劳动力投资产生影响？有何影响？潜在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对各类技能的劳动力投资又会有怎样的影响？已有文献并未对这些问题给予解答，但综合来看，以上问题具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本文将就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本文的主要贡献可能有：首先，文章丰富了劳动经济学与金融（Labor and Finance）领域的研究。近年来，劳动经济学与金融的结合成为国际学术前沿，而公司金融与劳动经济学的结合则是重点研究范畴。关于劳动力的投资，主要研究融资、公司治理等对企业劳动力投资的影响，学界尚未从供应商视角展开研究。本文从供应商角度找到了影响企业劳动力投资的新因素，并且在理论分析和作用机制上基于劳动经济学与金融结合的理论展开研究对劳动经济学与金融领域有所贡献。其次, 本文拓展了供应商-客户关系的相关研究。以往的供应商-客户关系的研究多集中于在关系专用性投资理论、谈判力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供应商-客户关系对 企业商业信用、企业业绩、现金持有水平等的影响，少有文献研究其是否影响到企业的劳动力投资决策,本文在这方面提供了论证和相关经验证据。

引言二：

媒体数字转型技术路径发展研究——产业经济学视角

《[经济问题](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JJWT" \t "/Users/xushaoqian/Documents\\x/_blank)》 白瑜 强月新

人工智能等媒体技术给媒体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媒介形态也因新技术的诞生而呈现出多样化。媒体组织在技术选择过程中受诸多因素决定，关键市场主体决策对产业发展产生整体影响。对产业发展规律的研究，有利于决策部门根据产业发展各个不同阶段的规律及时调整产业政策，也有利于企业根据这些规律采取相应的发展战略。

在媒体实践中，部分媒体在得到政府或市场的 资金支持后，在技术选择方面存在资源错配现象。一方面，部分媒体跟风选择不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技术产品，造成了资金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缺乏相应的人才，许多媒体不能将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优势最大化。这些问题都不是简单的资金问题，而是整个发展机制的动力问题。

动态的收益递增导致经济发展被逐渐锁定了某一个结果，而这个结果未必是最优结果。如果市场领跑者早期选择了当初有吸引力但是后来改进缓慢的技术，就有可能将整个市场锁定在最初的选择上。从长期来看，被排除的那种技术如果得到了同等程度的开发，那么市场内行为主体的盈利情况都会得到改善。

本文将从产业经济学视角，具体梳理媒体数字经济转型技术路径发展，探讨某一种媒体技术是怎样被锁定并逐级占据垄断地位的过程，尝试从经济学视角为媒体组织决策寻找最优解。

引言三（引言与文献综述）：

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视角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杨云霞 张宇龙

( 一) 人工智能: 发展、内涵及应用

1936年，艾耶尔( Alfred Jules) 在思考心灵哲学问题时指出人类与机器的差异。1940年，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提出“机器人三原则”，旨在避免人类受到机器人的威胁。1950年，图灵( Turing AM) 提出著名的图灵测试(他自己称之为模仿游戏) : 若机器能够与人类通过电传设备展开对话而不被辨别身份，那么机器就具有智能。上述研究成果为人工智能的形成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 Dartmouth Conference) 首次正式探讨机器对人类智能模拟问题，标志着人工智能学科诞生。此后，人工智能共历经三次发展高潮。第一次是 20世纪 50年代中后期至 20世纪 60年代中期，以定理机器证明、发明首台聊天机器人、开发跳棋程序等为典型事件; 第二次是 20世纪 70年代初至 80年代中期，专家系统在运用专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相继被投入于医学诊疗、地质勘探、化工等领域; 第三次是 21 世纪初延续至今: 互联网、电子商务、搜索引擎、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通讯技术和物联网等推动人工智能向纵深发展，以智能化、网络化、数据化为典型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

上述历程一方面表明人工智能取得瞩目发展成就，另一方面反映出人工智能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技术科学的紧密关联。然而，似乎人们对其概念尚未达成一致。何为人工智能既是人工智能领域元问题，也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学者们见智见仁，或依据实际需要对其界定，或直截了当使用该概念。回顾相关文献，依然可以归纳出某些共识。一是技术层面，人工智能以模糊逻辑、自然语言处理技术、遗传算法、卷积神经网络、对抗生成网络和人工神经网络等为基础技术并不断发展。二是内容实质，人工智能旨在利用机器模拟、延伸、拓展人的智能，核心是机器对人类思维方法与思维过程的学习。三是前沿关注，学界对人工智能的聚焦更偏向自主决策能力，反映出人工智能发展的主要 任务与未来趋势，但也体现出伦理风险、社会疏离、模仿攻击以及数据滥用等困境。四是社会影响，人工智能是第四次工业革命通用性技术，重新定义了人类生产生活与社会经济发展，已然成为全新技术场域、重要生活景观、公共交往空间，以系统智能性、巨大赋能性、数据承载性、高度渗透性等推动社会进步。

近年来，人工智能赋能弈棋、翻译、信息通讯、无人驾驶、电子政务、语音与图像动态识别、法律咨询和智慧城市等快速发展，极大便利了日常生活。“智能+”不断融入经济主战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释放结构红利，培育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农业、制造业、养老产业等领域发展大有裨益。人工智能在基于现实需要帮助人类解决复杂问题上所呈现出的强大功能，以及它的发展速度、光明前景，是大多数人始料未及却又在情理之中的。

( 二)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仅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近几年我国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部分工农业产品价格降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限制因素。矛盾变化呼唤和要求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核心，以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为手段，以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为导向，保持中高速，迈向中高端，坚持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面，也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要矛盾在文化领域体现出高质量文化产品、服务供给不足，人民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还不能完全满足。从供给层面看，我国无疑是文化大国而非文化强国，文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较为突出，为群众喜闻乐见、兼具思想性艺术性的文化产品较为缺乏。从需求层面看，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使人们基本摆脱贫穷落后状况，更高层次精神文化需要自然也必然会成为人们的新期待新追求，而且这种需求结构持续升级，发生深刻变化。供需矛盾导致人民由普通休闲娱乐活动步入高品质精神生活面临困境，对发挥文化产业形成社会福利效应、丰富人们精神世界、社会资本文化培育造成阻隔。人工智能是模拟、发展人类智能的机器及其科学体系，是新时代新型工业化新动力、新引擎、新机遇。加速人工智能与文化创意、人才、资本等要素深度融合，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优化经济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要求; 另一方面是提升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美好生活的内在遵循。总之，运用先进技术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

( 三) 人工智能赋能文化产业提质增效: 宏观、中观与微观研究动态

人工智能开启的时代转型将其自身纳入生产要素配置前端。文化产业是“具有娱乐性、精神性的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活动”。这一产业立足于人们日常生活，具有温润心灵、精神娱乐、陶冶情操、思想教育等人文关怀价值。伴随人工智能技术、文化供给侧和需求侧等发展变化，人工智能赋能文化产业提质增效。宏观地看，LePL( 2013) 、解学芳( 2018) 认为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技术与文化产业崛起的必备条件高度契合，带来文化产业链、技术链和创新链加速融合，实现智能化创新与数字化重塑。中观地看，Hansen M( 2017) 、杨毅等( 2018) 提出运用 K－means 聚类算法等技术，人工智能能够为文化企业与消费者创设神经网络，具备需求分析、创意生成、机器学习、文化传播等方面独特优势，促进文化创新生产、精确传播和消费升级，但也存在创意流失、灵韵枯竭、价值销蚀等缺憾。微观地看，Ying Liu( 2016) 提出借助智能动画辅助等技术可以有效提高现代动画动漫制作效率与水平; Shahzad F( 2017) 认为智能电视、手机、手表等设备以及 AＲ、VＲ 技术能够更好洞察用户心理，带来文化服务的体验式消费。不难发现，学界对人工智能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贯穿于文化产业全产业链，成果较为丰富。但不可否认的是，已有文献存在重实践、轻理论、作用机理阐释不明晰等问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出发点，从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切入，在新时代背景下创造性阐明人工智能驱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力争有所突破和创新。

引言四：

互联网经济对反垄断法的挑战及制度重构———基于互联网平台垄断法经济学模型

《浙江学刊》 张枭

数字经济时代，伴随着以搜索引擎、社交网站、电商平台等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爆发式增长，谷歌、脸书、腾讯、阿里等中外巨头迅速称雄网络世界，垄断之弧笼罩互联网平台。全球反垄断诉讼随之此起彼伏，然而与传统案件不同，互联网个案判决常大相径庭。2001 年以来，美国一贯支持互联网垄断，为 GAFM（谷歌Google、苹果 Apple、脸书Facebook、亚马逊 Amazon、微软 Microsoft）等超大型平台大开方便之门；欧盟则针锋相对地升级反垄断举措，屡次发动对国际巨头的司法诉讼并征收巨额罚款，④由此引发的争议不绝于耳。国际上Lianos等、Mays 对互联网垄断的批判与Crandall、Gisser对反垄断必要性的否定同时存在，对市场支配地位认定等适用标准的讨论更加莫衷一是。2020年前后我国学术界也围绕平台垄断与反垄断法大修百家争鸣。互联网反垄断法理基础上，傅瑜、谢运博等以数理模型力证互联网垄断的高效率与反垄断的不合理性，熊鸿儒、张枭等则强调互联网垄断的性质随市场发展阶段的转变而发生质变，引发与SCP范式、行为主义等传统观点的激烈争论。 反垄断法实体制度中，平台集中方面，孙晋等发现互联网行业拥有不同于传统行业的独特特征———冒尖效应，强调政府干预应弱化市场份额监管、开放网络基础平台、实现生产者集中救济的理念转型；网络支配地位滥用方面，张素伦等就免费搭售、个性化定价、大数据杀熟、强制商家“二选一”等新型法律行为展开讨论，张江莉等则为产品界定、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界定、相对优势滥用界定提供了顶层设计与SSNIIP工具创新方案；而垄断协议方面，因互联网市场激烈竞争掩盖了各大平台间的算法合谋性协议，相关研究暂未开展。反垄断法程序制度中，适用除外制度引发学界高度关注，张素伦等着眼于“必需设施属性”适用于互联网反垄断个案的明显分歧，提出必要设施属性之辩本质是在互联网平台竞争中要妥善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综合来看，除SSNIP等工具革新外，以上研究均强调互联网垄断与传统行业大相径庭、现行反垄断制度亟待重构，但回应措施却仅限于国家管制、价格管制、收益率管制等经济调控手段，与谦抑干预理念、包容审慎态度、灵活有序执法等普遍法治原则，反垄断法重构可操作性建议明显不足。当下，系统建构互联网平台垄断法经济学模型，明确其对工业经济时代反垄断法的具体挑战，探究中国反垄断法制度重构最优路径至关重要。

引言五：

民国时期中南地区经济学的发展—基于中南财经学院教授群体经济思想的考察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https://kns.cnki.net/kns8/Navi?DBCode=CJFD&BaseID=ZLCJ" \t "/Users/xushaoqian/Documents\\x/_blank)》 邓杨

民国时期是中国经济学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转型期，这一时期日趋完备的经济学教育体系、日渐壮大的经济学学者队伍、日益丰富的经济学学术成果，推动着中国近代经济学的发展。作为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核心区之一，中南地区（主要指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汇集了多所知名学府和众多专家学者，成为近代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南财经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成立的第一批正规化的财经类院校，其前身是中共中央中原局在1948年８月创建的中原大学。在1952～1953年的院系调整中，国家在中原大学原财经学院基础上，合并河南大学经济系，武昌中华大学经济系，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的财经学院，中山大学、湖南大学及南昌大学经济系，广西大学经济系及会计银行系，中山大学社会系劳动组等系科，组建了中南财经学院。

上述院校均具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中山大学1924年开设经济系，在后来的办学历程中，岭南大学、勷勤大学、国民大学、广州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高校的经济学科并入，使其经济学科实力进一步增强。1926年湖南大学成立之初即开设经济系和商学系，国立商学院、民国大学先后并入，荟萃了众多学者和学科资源。河南大学1927年开设经济系，南昌大学前身是国立中正大学，广西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等高校也都较早开办近代经济学教育。

通过院系调整，中南财经学院事实上集合了中南地区大部分经济学资源，学科专业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学校先后设立财政信贷、合作贸易、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会计、统计、国民经济计划、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史、经济地理等系室，构建了学科门类比较齐全的经济学高等教育体系。1953～1957年间，学校有教授87人、副教授22人 ，远远超过全国高校平均水平。他们中间大部分毕业于海内外名校的经济学或相关专业，接近一半拥有海外学习经历，覆盖本科、硕士、博士等学历层次，为学校财经类学科整体进入全国领先优势学科行列奠定了基础。因此，透析中南财经学院经济学教授群体在民国时期的经济思想，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南地区经济学在民国时期发展的概貌和整体特征，从区域经 济思想史研究的视角深化民国经济思想史研究。